

臺 灣 原 住 民 史

鄒族史篇

王嵩山 汪明輝 浦忠成 著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臺 灣 原 住 民

鄒 族 史 篇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統一編號

100900232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原住民史。鄒族史篇／王嵩山、汪明輝、浦忠成撰稿

——南投市：省文獻會，民 90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2-8672-5（精裝）

ISBN 957-02-8673-3（平裝）

1. 鄒族—歷史 2. 鄒族—社會生活與風俗

536.295

90010294

臺灣原住民史

鄒族史篇

撰稿人／王嵩山、汪明輝、浦忠成

召集人／黃癸楠

副召集人／楊正寬

總纂／石磊

副總纂／李壬癸、余光弘、林修澈、許木柱、潘英海
劉益昌、蕭金松、蔡明哲、藤井志津枝

監纂／吳明義、洪敏麟、莊英章、許雪姬、林金田
呂順安

發行人／楊正寬

發行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049) 2316881

印刷／財政部印刷廠

地址：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

電話：(04) 24953126

定價／精裝 270 元·平裝 22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

ISBN：957-02-8672-5（精裝）

ISBN：957-02-8673-3（平裝）

序

本史篇的主人鄒族，舊稱曹族，一般分爲南北二大族群，以北鄒族爲主幹，人口佔最多，分布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之達邦、樂野、來吉、里佳、山美、新美、茶山七村，以及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久美社區。北鄒族過去有達邦、特富野、鹿都及伊母祝四大亞群，本世紀伊母祝幾乎消滅，殘餘者加入特富野，每一亞群各有其獨立之祭典和政治領域，有方言差異，但溝通無礙。南鄒族則有堪卡那富、沙阿魯阿二群，人口皆少，其中堪卡那富群主要分布於高雄縣三民鄉民生村與民權村，沙阿魯阿群則分布於高雄縣桃源鄉之高中村與桃源村，兩族在服飾等許多方面很相似，但語言彼此不通，與北鄒族也不相通，過去他們是該地的唯一主人，但今日則布農族佔絕對多數，兩族承受著嚴重布農化之窘境。截至八十四年底的鄒族人口，約六千六百四十人，其中北鄒族聚居嘉義縣內有三千八百八十九人，南投縣有二百三十五人（不包括邵族），以臺北縣四百二十九人，嘉義市二百一十四人，桃園縣一百四十二人，臺中市一百零七人，臺北市和高雄市合計不超過三百人等爲數較多外，其他縣市只有少量分布。

臺灣過去歷史之記錄著述，多以承繼中國正統歷史爲史觀，亦即以中原漢民族爲中心觀察、考證、記錄臺灣歷史，歷史主體爲中國一漢人，臺灣史成爲中國邊疆史，成爲漢人開拓史，這意味臺灣島只有到漢人出現時才有歷史，於是連橫之《臺灣通史》起頭便說「臺灣固無史也」，近來史明也只能撰寫《臺灣四百年史》。不僅壓縮了時間深度，同時都將非漢人從他們所建構的臺灣及其歷史中排除了，這種歷史就今日處於後現代多元社會或後殖民時代觀之，只能算是「他

者」被殖民歷史，而非臺灣的主人。

原住民史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藉著確認原住民在臺灣及其歷史之主體地位，將臺灣史之時間深度推至遠古時期，並得以平行對照中國大陸漢人歷史進程下，確認臺灣歷史之獨特性，達到歷史的解殖。然而即使是臺灣具有獨特歷史之事實，因為臺灣漢人及原住民族內部存在甚大的歧異，各族之社會文化及其居住空間環境不同，因此，臺灣歷史不能視為單線均等地進展，不僅漢人與原住民族之歷史經驗不同，各原住民之間的歷史發展也各異，各有其特殊性及主體性，因而臺灣之歷史無疑是多條樣且必定相互糾結之歷史面貌，這是撰寫原住民族史首先需要明瞭的背景脈絡。其次，在此脈絡下如何呈現歷史中原住民主體性，涉及到撰寫者之族群身分，以及撰寫使用之文字或語言問題，最理想的情況下為本族人以族語撰寫自己族群之歷史，才能對族人經歷之歷史事件提出主體性描述與詮釋，然而現實上沒有這樣的條件，仍得依賴中文書寫以及從中文為主歷史文獻記錄蒐集相關資料，而且這樣的工作對為數甚少且歷史專業不足的原住民學者而言，在缺乏前人撰述或調查經驗累積之引導下，多少得自我摸索從事這先鋒性修史工作，其間之艱難和挑戰自不得言。

鄒族史之編撰，由一位長期研究鄒族之人類學者王嵩山博士，及具有博士學位的兩位鄒族學者汪明輝、浦忠成共同參與，構成了最堅強的陣容，正企圖避免前述之窘境，即一方面突顯鄒族之歷史主體性，同時藉著三位累積相當時日的鄒族研究經驗，以期減緩修史之難度，而不同的專業背景，儘管存在著彼此對歷史事件或文獻解讀觀點上的可能差異，亦可發揮互補性之分工合作。不論如何不同，這樣的組合已經開展出對鄒族相關史料或事件之對位式閱讀與撰寫的可能，亦即站在不同於漢人立場對同樣史料讀出、寫出久被忽略或埋沒的事實真相。

鄒族史應該包括的內容是什麼及該如何呈現，受限於作者之經驗背景及其關注的興趣，也受字數、篇幅以及時間與能力之限制，這些現實條件都反映在最後成果上。基本上，本史篇可以說是選擇性之主題的歷史論文集，如浦忠成關注於鄒族之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之文學分析，汪明輝則重在鄒族歷史之空間領域變遷及其圖繪，王嵩山則秉持則對鄒族政治過程、社會生活及宗教儀式等之變遷發展的興趣，從而形成本史篇之主要內容。同時也就造成選擇性地略過其他重要的歷史主題，比如鄒族經濟或是教育文化方面之變遷，其實也蒐集相當豐富的資料，因諸多限制，只好寄望未來更多鄒族參與者繼續完成。

本史篇基本上將南北鄒族三大亞族分別敘述。本史篇分成八章，分別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神話與傳說中的歷史文化面貌，第三章鄒族領域變遷史，第四章鄒族政治史，第五章宗教與社會發展史，並附錄有鄒族大事年表，鄒語漢譯對照表。大體的分工是，第一章由三位共同執筆，其中第一節由王嵩山教授闡釋鄒族史觀作為開端，汪明輝教授負責方法論增補，第二節由汪明輝撰述鄒族分類與分布，浦忠成教授撰述鄒族人口與都市鄒族，第二章由浦忠成教授執筆，第四章、第五章由王嵩山教授執筆，汪明輝教授則負責第三章及最後各章節的彙整，並編輯附錄之鄒族大事年表及鄒語漢譯對照表，最後王嵩山教授參與總校對，方得以完稿付梓。而本人則尸位素餐，除參與偶而的田調工作和多次的討論協調外毫無貢獻，但作為一個生長在阿里山腳下的鄒族鄰居而言，從小多次目睹穿著傳統服飾的鄒族老人，沿著阿里山鐵路昂首闊步而行的記憶，以及曾經五次帶領政大山服隊服務原住民的因緣，閱讀之餘難掩喜悅之情。

本史篇的撰寫過程中，作了多次的田野調查和資料收集，期間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從主任委員以下各級長官的支持和指導，特別是專案小組陳美惠女士的耐心和辛勞，以及相關地方政府、民間機構和鄒

族人士的幫助，其中阿里山鄉達邦部落頭目汪傳發，特富野部落頭目汪念月、長老鄭政宗、樂野部落長老武義德、鄭茂李、汪蓮花，山美村長老高正勝，茶山村村長李玉燕，桃源鄉部落頭目余中清，高中村長老游仁貴，桃源國小謝垂耀主任，三民鄉鄉民代表大會主席翁博學，三民鄉鄉公所余瑞課長，長老孔文良等人的協助尤多，謹此致謝。

蕭 金 松 謹序

摘要

本鄒族史的研究，以專史的角度出發，呈現社會文化與歷史的關係。

目前僅七千餘人，聚居在嘉義縣阿里山鄉與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的鄒原住民，早在十七世紀荷蘭人佔領臺灣以前，就已在阿里山山脈，曾文溪上游和濁水溪、楠仔仙溪之間的廣大山林，形成一個個「以中心大社、聯合數個衛星小社」的「部落(hosa)」。事實上，鄒人可能早在三、四千年前變遷移至臺灣。史前的故事，以西方與東方為主軸所建構的宇宙，還在延續著。中心與邊陲所構成的結構不變，組織元素則不斷的在轉換。

在神話與傳說尚未死亡的時代，大神哈默(hamo)用楓葉創造了鄒人和瑪雅人(Maya)，再用茄苳的葉子創造平地人。神尼夫努(nivnu)，看著坑坑谷谷的崗巒，一腳踏在特富野社山上，另一腳跨到達邦社山巔；也曾邁向公田山，留下了米糕化成的白色玉石，做為見證。這時，鄒傳統領地(hupa)，大致形成。神話描述西部、東部、南部、北部都一樣；既有的世界結構，原來就是不均平的，到處是隆起和陷落。尼夫努神再走向阿里山山脈西邊，踏出了平整沃野連綿的嘉南平原，作為神應允鄒族之地。神聖、日出光明的東方，矗立著大神造人之地、鄒人與其他族群避居洪水的聖山；八通孤阿那(玉山)；和祖先之靈魂歸之處：塔山。

十八世紀，來自幽黯的西方的絃歌漢語，終究是祖先們無法阻擋的狂流。武力衝突、交易欺騙、天災疾疫，波波接應，襲捲鄒地。由於信仰，也由於政治經濟的弱勢，身著漢衣的疾疫惡靈、肆虐鄒地。

吳鳳之靈 (*hitsu no Ngohoo*)，足足壓制、困擾了鄒近二百三十年。來自西方的異族，違反了傳統的先佔與依序分配的部落律法。玉山、阿里山，曾文溪、濁水溪、楠梓仙溪，大片大片百獸蟲鳥棲息的獵場，紅楓、杜鵑、檜木、牛樟、杉木、竹圍的林地，水豐魚肥的漁區，都變成後到的鄰居的財產。土地、河域、樹木、狩獵……諸靈，靈力盡皆被剝奪、失去千年以來的寓所。

二十世紀中頁，白色恐怖的混亂時代，鄒失去數個屬於全族、具大視野的領導者。此後，政治事件的歷史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原有政治系統為異族操控，傳統階層被迫萎縮在決策的邊緣。鄒更成為瘖啞少言、眉宇沉重的民族。姓氏名字亂了。原來清楚的氏族系統，卻已必須經過行政系統所推廣的「宗親會」，來加以重整、產生認同、確認不會「自綁生命」的婚配的對象。異文化教育隨之而來。但是爬過山頭後的教育資源和觀念熱誠，層層剝落在山巔、河谷。隨著平地化教育的「進步」所挾帶的文化偏見，鄒的山林與人文知識，鄒的母語能力愈來愈衰弱。資本主義毫不留情的進擊。阿里山公路直如銳利的箭矢、射向鄒的心臟；攜家帶眷的漢人過客，用平地的開發主義、宰割山地；沿線鄒地只有逐漸崩潰。山上的生態問題已盤根錯結，鄒人動輒得咎，必須承擔漢人侵墾的惡果和罪愆。晚近觀光事業蓬勃，卻也導致社會和生態環境的雙重污染。鄒人清楚知道時代在改變著，問題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鄒人不想停留在過去，但過去從來未在歷史中隱身。

鄒人的史觀，呈現出時間前後連貫、循環往覆的講然秩序。過去是現在的來源、基石、階梯。就像一棵樹，過去是根幹、現在是分枝。容易感受到歷史因果關係的集體意識，使鄒人在政治適應時，表現出極特殊的「保守主義」。謙虛、不強出頭是傳統社會中的美德。而團體先於個人的思考，進一步鞏固了原有社會組織中的「集體性原

則」。近年來長老們仍一秉傳統的觀念，貢獻社會與文化記憶、對年輕的一代循循善誘、傾力培養。鄒族的年輕人，更主動的參與傳統文化的復振與重建，在傳統部落與家族宗教儀式中，扮演學習者、甚至執行者的角色。每年祭典期間，除了嚴謹的舉行傳統儀式之外，各村有備而來的傳統歌舞比賽，以及近幾年來各村的漁區生態保護行動，更可明顯的看出鄒人對自己文化的體認。而大家族制的價值觀，扮演一些吸納年輕人回山上定居的功能，減少在平地泥沼裏，流離失所的鄒族後裔。傳統的收養制度，更使其不至於以單純的生物體上的差異劃出族群界限。

鄒人知道知識的重要性，既重視教育的傳承，也願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避免了階層社會互動的遲滯。早在日據時代，便有族人步行下山、主動要求接受教育。光復之後，父母也頗為重視子女的教育。家是根幹之處。根幹的支持，是鄒年輕「分枝」成長的重要條件；配合著重視教育的傳統，使得鄒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頗高，也使他們能適度的掌握外在社會的動態和思考方式、獲得資源，從而在有限的角度中得到較好的適應。因此，大部份的鄒人，並不受制於迫在眉睫的生存問題。但生命的終極關懷，依然有具體的主觀與客觀危機及困局。

首先，由於外來社會體系的引入，改變政治、經濟、宗教、親屬等各方面的關係，增加內在衝突、動搖族群存在的社會基礎。其次，外來殖民文化的影響，使鄒文化開始產生文化一致性、樣板化、類同西方化的驅向，出現族群認同的污名化的危機，導致主體性的消蝕。第三，鄒不但喪失文化詮釋權，族人對傳統文化詮釋的能力，也進一步的被削弱；進入國家體系之後，對歷史事件反叛與革命的不同史觀，使其遭受歷史意識威脅。第四，文化(或生活方式)既遭國家力量與資本主義市場剝離，文化傳承教育亦因此產生斷裂。近年來雖有文化復振的運動，但文化重構與社會體系既分離發展，而文化復振的

組織形態，又往往以漢人現有系統作為參考對象，更缺乏有效的族群組織與基地。

處於八〇年代以來，強調地域化差異性，地方文化形式被用來與國家體系和舊有的權威觀念相抗衡的臺灣社會脈絡，鄒人通過行政體系與民間團體互補的操作。這種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社會文化體系中組織與象徵的互補，不但可以結合個體和社會，也可以結合文化與社會層面。在政治社會組織無法具有主體力量的鄒人，轉而通過實踐特殊的文化形式，形成族群界限、而得以和異文化有所差異，確保族群的資源或象徵資本。這樣的企圖，使其當代的文化重建，顯示出「超越部落主義」的特徵；也藉由原有「二元對立同心圓」中的主幹與分支結構原則，化解內部政治實踐上所可能產生的衝突。由於更進步的交通、現代媒體的迅速採用和發展、教育程度與識字率的提高、以及所謂「文化資本主義」的擴展，使人們意識到集體的族群認同，可以在政治行動中被使用和操縱。也由於文化互動的頻繁、外來文化無孔不入的侵蝕，產生發掘文化差異，通過傳統文化形式的重構，設立文化界限、以建立族群主體性的需求。

依據集體知識建構的男子會所（*kuba*），依舊昂然的標幟著部落，垂護著鄒的生命；既刻劃過去、也指引未來。禁忌之屋，提點鄒種種合宜的家族關係、道德堅持。戰祭與小米的儀式，也仍分別在達邦社與特富野社戒慎的實踐著，定期的喚起獨特鄒（人）的生命、文化與社會的集體記憶。

ABSTRACT

In previous chapters we have tried to expose history of the Tsou. We have shown th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revealed by 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the Tsou at different stages as various historical factors affect the social structure principle.

The society of the Tsou has increased in complexity, they neither live in a timeless present nor possess an integrated tribal culture. The change in social forms among the Tsou causes individuals who were involved either in public or private realms to have a varie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ve knowledge; which results, on the face of it, in different social cultural practices. The important main or original house (*emo*), the forbidden house (*monopesia*), the men's house (*kuba*), the belief system of the spirits (*hitsu*), the millet rituals (*miapo and homeyaya*), the war rituals (*mayasvi*), and the 'main settlement centrism' have not disappeared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nd the influx of Western religion, but have continued to be passed on by the Tapang and Tufuya main settlements-despite the interacting influence of such historical factors 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shifts.

The murder of the official translator Wu Fong in 1769 is regarded by the Han Chinese as 'a process whereby an uncivilized people is transformed into a civilized people by abandoning the savage behaviour of head-hunting'; the manipulation of ethnic separation policy by the Japanese is somewhat mixed in this process to cause conflict between the Han Chinese

and the Tsou. All this, related to the Tsou belief system, encourages the tribal member to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gic and Wu Fong brought about the outbreak of smallpox. The Tsou believe that outside forces can intrude not only into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world, but also into the supernatural. Whether the Tsou can resist or not depends on the strength of the outside forces. The Tsou believe the magic of Han Chinese to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ir ow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even better expressed in the ceremonies relating to war and the repair and rebuilding of the men's house (*e'kubi*), and may be also deeply hidden in the lineage ceremonies connected with consecrating the forbidden house.

During the Tsou people'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values have had a strong influence. Under the great pressure from the outside power, the tribe chose to seek for help from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New leadership closely interacted with traditional power, and the inherited hierarchy remains in the society. The social solidarity based on clan organiz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based on bureaucratic principles were became consolidated under the interweaving influences of the tribal traditio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new power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e phenomenon could be observed clearly from the organizations'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power structure. Thus, the Tsou'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valu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tribal chief has become a divine symbol of traditional tribal values, and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rituals such as the *homeyaya* and *mayasvi*-though, in the recent *mayasvi* held in the Tapang and Tufuya main settlements, we have learnt that the two main

settlements have held the ritual separately since 1985, which slightly reduc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ongsi*. Meanwhile, elders of the tribe still maintain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s unde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rule, acting as community head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ownship, leaders in local organizations, priests and teacher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elder *mameyoi* had the authority to mediate among tribal people; in the modern world, as committees in the villag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they still possess authority. In other words, while the *peongsi* has lost political power, the *mameyoi* has taken over through making a certain consensus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tribe's strong tradition, Japanese indirect rule through the police, and the tribes' taking Japanese as their legendary brothers-prevent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new ruler and the indigenes-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t that time. Unde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rule, however, the *peongsi's* power declined, and the chief became a divine symbol of the tradition and the religion; all this could be observed from the fact that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s had taken over from chiefs in Tapang as authority figures. Though lineages with traditional higher social status had more chances of obtaining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their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inciden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the 1960s reduced their opportunities in politics. The Tsou people, under the historical pressur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clined to react with their traditional thinking which, on the contrary, enhanced the new leaders' powe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ain settlement centrism',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concepts of centre and origin, the Tsou trust in their elders to help consolidate the tribe. However, their absolute obedience to a centre or to a

leader causes them to easily surrender to political pressure. Traditional leaders' political roles declined after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al rebellions against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the 1960s. Nenertheless, new leaders received the same support, and their position was stabilized by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absolute loyalty to the centre. This political pragmatic conservatism can be found in the Ching Dynasty, in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return to Republic of China.

鄒 族 史 篇

目 錄

序.....	i
摘要.....	v
第一章 序論：族史的當代建構.....王嵩山.....	1
第一節 鄒族史觀、結構與方法.....	1
一、鄒族史觀.....	1
二、結構與方法.....	8
第二節 鄒族概述.....	11
一、族群分類與分布.....	11
二、人口.....	13
三、都市的鄒族.....	15
第二章 神話與傳說中的歷史文化面貌.....浦忠成.....	19
第一節 阿里山鄒族.....	19
一、洪水.....	23
二、氏族遷徙的故事.....	25
三、英勇故事.....	35
四、集體概念與知識起源的故事.....	45
五、神聖儀式.....	48
六、傳奇故事.....	51
第二節 南鄒族群.....	61
第三章 鄒族領域變遷史.....汪明輝.....	67
第一節 北鄒族領域變遷史.....	67

一、北鄒族領域史觀·····	67
二、口傳古代領域史：十七世紀前之領域建構與拓展·····	69
(一)、神話遷移·····	69
(二)、歷史遷移·····	70
(三)、聚落體系與部落領域之形成·····	84
三、近代北鄒族領域變遷：荷據時期至清末·····	87
(一)、荷人時期·····	87
(二)、明鄭時期之鄒族領域·····	97
(三)、清帝國時期鄒族之領域·····	101
四、日治時期鄒族領域·····	129
(一)、背景·····	129
(二)、蕃地無蕃人政策·····	131
(三)、蕃地管制與隔離·····	134
(四)、日治初期鄒族歸順與政權交替下鄒族地權：阿里 山蕃地、番租·····	136
(五)、土地國有及土地與林野調查、整理政策下之鄒族 領域·····	147
(六)、「蕃人所要地」政策、集團移住與鄒族「蕃地」 面積·····	149
(七)、阿里山森林開發與政區劃編·····	154
(八)、定耕與授產與新經濟作物之引進·····	156
(九)、日本人的路·····	158
五、國府時期·····	163
(一)、戰後初期之動亂期 (1945-1954) ·····	164
(二)、「白色恐怖下之封閉性穩定發展 (1955-1975) ·····	179
(三)、交通改善後之經濟社會文化轉型 (1976-1982) ·····	185